

47-52

北美漢學研究現況*

Thoughts on the State of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

陳威 (Jack W. Chen) **

前言

2003 年, *Critical Inquiry* 的編輯委員會在芝加哥大學, 舉行一個專題研討會, 討論理論的未來, 當下立即成為「理論的終結」(end of theory) 的代表。¹ 這也許是一廂情願, 又或者它只是標誌批評理論家的常見傾向, 以理論的「危機」來反映當時知識、文化、政治和機構之間的緊張關係。然而它很可能精確的道出, 在美國文學研究中, 理論的卓越性已被大大的削弱, 尤其是 1970 到 1980 年代, 我們把理論話語視為文學研究的主宰——所謂「理論高峰的時代」(age of high theory)。今日還有誰嚴格的自我界定為一個解構主義、拉岡派或馬克思主義者? 又是在什麼樣的時間點, 理論高峰的時代過去了? 對歷史學家 Harry Harootunian 而言, 這個時間點或許是 Michael Hardt 和 Antonio Negri 《帝國》(*Empire*) 一書的出版。《帝國》企圖把哲學、文化批評、政治理論和經濟等各領域, 包容在一個龐大笨重的論點, 亦即民族國家範式 (the paradigm of the nation-state), 是如何被一個由大國整體網絡 (the totalizing network of the leading powers)、超國家機構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s) 和全球合作 (global corporations) 所構成的新世界秩序 (a new world order) 所取代。

這是本在 2000 年一出版即暢銷的書, 但又很快的從文化雷達中消失。根據 Harootunian 的說法, 這本書

「隨著九一一以來近一步的衝撞, 表示也彷彿預示……理論本身的崩潰, 也表示理論當做學術職業的崩潰, 以及它描述世界並對世界作重新詮釋之承諾的崩潰 (“signified and probably prefigured, with the added shove from 9/11... the collapse of theory as such, as an academic vocation and its promise to figure and thus interpret the world anew”)」。但《帝國》的最終結局或許被理解為沒有理論根據的失敗, 和沒有指涉對象、沒有明確性的失敗更好。在這些基礎上, 我們應找回對學科領域的重新堅持, 以及在西方文學研究的領域中, 回歸到文學和文學史的基點。對新批評持謙遜態度最知名的倡導者是 Stanley Fish, 他在同一個會議紀錄集中, 堅持「藉由更嚴密的聚焦……我們有最佳的機會把事情處理好, 以及對那些我們不直接言說的人群, 甚至避免言說的人群, 提出更有力的說明 (“by focusing narrowly we have the best chance both of getting it right and of speaking with power to the constituencies we do not directly address and, indeed, refrain from addressing”)」。對 Fish 而言, 知識不應只是置於學科的慣例和預期這樣的背景中來理解, 它是一個學科的功能。理論的目標總是在於特定的學科關懷, 應拒絕那種不可評價的模糊或籠統。

可以確定的是, 理論並未消亡, 雖然它目前處於縮減和重估的時期。理論應該是怎樣, 是一個理論探詢 (theoretical inquiry) 本身所重視的問題, 而當前的「危

* 本文為 2008 年 9 月 19 日於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的講演紀錄, 並由臺大中文所碩士生陳籍如翻譯為中文。這場演講屬於 NTU-UCLA Joint Seminars in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的系列演講之一。

** 作者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助理教授。

1 會議紀錄已出版於 *Critical Inquiry* 30.2 (Winter 2004), pp. 324-479。

機」(如果真是如此)或許僅能被視為是製造更多理論的另一個機會。同時文學系確實有制度的問題,因此對理論的強調將它們遺留在公共話語的邊緣,以及暴露在更多傳統學者的奚落中。²

很難想像這樣的對話發生在狹小及局限如「美國的漢學研究」的領域,這不見得是不好的——至少可以視為是一種好壞參半的情況。我認為缺乏學科方向的主宰,對防止漢學研究過於沒有理論根據有所幫助。美國漢學研究的起源可以說是源自於三種知識和體制的形構:1. 早期歐洲文獻學,可以追溯到16、17世紀,耶穌會傳教士辭典編纂和翻譯的工作;2.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興盛,直接由政府資金支持的區域研究範式;3. 20世紀英美文學和比較文學研究。接下來,討論這三個起源形構的範疇,以及簡短的討論當前的情況。

一、早期歐洲文獻學

歐洲文獻學的傳統在漢學研究中不能被誇大,雖然它對古代漢學研究界的影響是明確和積極的。Edward H. Schafer 指出,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如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等,是第一批嚴肅從事漢語研究的歐洲人,他們努力的成果引導了西班牙多明尼哥會的修士 Francisco Varo (1627-1687) 最初的漢語語法研究,以及 Université de Paris (La Sorbonne) 和後來 Collège de France, 首次藉由出版使漢學制度化(1814年)。³ 這樣的脈絡下,漢學不是最初所想的,一個語言研究的學科知識,因為唯有精通語言和文法才能夠研究中國的文化

傳統。此外,當漢學在法國發展,引入對校勘原則和材料可靠性及書目研究的注意,努力的成果使學術標準達於《聖經》考證的程度。德國漢學家同樣也對這個領域做了相當大的貢獻,雖然他們並未參與對中國的傳教或官方貿易,其早期歷史大部分是來自其他國家翻譯的衍生。⁴ 但我們仍然不能忽略德國文獻學的傳統,尤其是19世紀,在文本學的發展上是非常具有影響力的。然而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廣泛從德國移民的漢學家,意味著後戰時代,許多大學在跟上法國、英國及持續發展的北美漢學有著困難。⁵

文獻學傳統的繼承,在北美的古代漢學家社群中,可以說仍掌握了主宰地位。學者們如 Edward Schafer、Hans Frankel (來自德國的移民)、David Knechtges、Paul Kroll、Wilt Idema (來自萊頓的移民) 和 Stephen West, 代表文本研究的主要典範。文獻學的特質,即在於方法論或理論原則是難以明確表達的。事實上,文獻學術的許多觀點在現在似乎已經成為常識,甚至被簡單的認為是「學術」本身,舉例來說:確認最可靠的原文本的必要性、對異文的注意、細讀和對過往學術的承認,還有對原始文本的翻譯註解。如果文獻學術下有一個核心假設,那即是對現存文本的嚴謹考證和比較,查明其成為最可靠的文本。這樣的假設會同時具有強弱二類,我稱之為「文獻實證主義」(philological positivism) 和「消極文獻學」(negative philology)。最近的文獻實證主義之例是 E. Bruce Brooks 和 A. Takeo Brooks 的《論語辨》(*The Original Analects*, Columbia University, 1998), 其意圖辨別《論語》的歷史層次,包含那些代表真實的傳達出歷史上

- 2 這個轉變,參見 Michael Bérubé, *The Employment of English: Theory, Jobs, and the Future of Literary Studi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1997)。亦闡明於 Andrew Delbanco,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Literatur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46.7 (Nov. 4, 1999)。
- 3 見 Edward H. Schafer, "What and How Is Sinology?" *T'ang Studies* 8-9 (1990-1991): 23-44。亦見於 Paul Demiéville, "Organization of East Asian Studies in Franc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8.1 (Nov. 1958): 163-180。Varo 部分見 W. South Coblin, "Francisco Varo and the Sound System of Early Qing Mandar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8.2 (Apr.-Jun. 1998): 262-267。
- 4 見 Birgit Linder, "China in German Translation: Literary Perceptions, Canonical Texts, and the History of German Sinology," in *One into Many: Translation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ed. Tak-hung Leo Chan (Amsterdam and New York: Rodopi, 2003), pp. 243-283。
- 5 見 Martin Kern, "The Emigration of German Sinologists 1933-1945: Notes o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Chinese Stud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8.4 (Oct.-Dec. 1998): 507-529。

孔子時期的段落。⁶ 相較之下，消極文獻學的方式抵制直接真實宣言的製造，而從現存文本證據來排除錯誤。這是更為主流的現代文獻學立場，儘管缺乏布魯克斯主義（Brooksian）方法上的大膽自信，或許在建立可以確實陳述的特定文本方面，更為精確。

二、區域研究範式

三個漢學傳統中的第二個是區域研究範式，它代表一個嘗試，暫停知識的學科生產，支持新的探究對象：地理區域或領土、民族國家的空間。⁷ 非學科的，或更確切的說，多學科的強調是區域研究之關鍵點，因為這種學術的目的並非問某個特定學科主導的問題（「文學是什麼？」），而是問有關某些文化整體性的問題，特別是在當代的政治脈絡中（「中國的文學是如何與其他社會話語的形式相關？」）。這個範式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接下來冷戰，產生的 20 世紀地理政治狀況所直接導致的。外語的國家基金是由 1957 年 10 月，俄國人造衛星發射而促進，並引導了 1958 年國防教育條例的推動，包括提供高中階段的現代外語教學。⁸ 無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NGOs）如 Ford Foundation 同樣提供資金給主要的研究型大學，作為訓練區域研究專家之用。區域研究計畫的目的是任命一群專家，能告知美國國務院有關策略利益的事務。率直的說，美國需要更好的敵方情報。

不意外的，以策略情報為主導的範式，強調社會科

學和當代社會研究，與早期文獻探究較無關。同樣不意外的，區域研究亦受到對地理政治知識的帝國主義基礎感到敏感的學者的攻擊。最著名的評論來自 Edward Said 所爭論的，將區域研究等同於東方主義：

即使是現代英美的伊斯蘭研究權威 H. A. R. Gibb，也寧可自稱為東方學專家，而不是阿拉伯研究專家。Gibb 自己是一位古典主義的學者，也可以用那醜惡的新名詞「區域研究」來形容東方主義，因為這樣才可以顯示，區域研究與東方主義二者其實都是可互換的地理標題。⁹

然而提供給大學的資金也促使文學、歷史、藝術、思潮和語言學在大學地位的提升，這些並非都對地理政治的考慮有直接的貢獻。創立於 1941 年原來稱為 Far Eastern Association 的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也是公共和私人基金的受益者，但很快的在 1950 年代申明其外於政府的自治權，和其與美國逐漸擴大的政治環境的距離。¹⁰（值得注意的，相對於今日仍代表文獻學術傳統的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之建立傾向於現代、社會科學。）

至今區域研究傳統的問題還沒有被完整解決。爭辯區域研究多學科的傾向有諸多牽引，會有很大的壓力，因為大部分的西方中國學者仍執著於學科的區分，特別是社會學、政治科學和經濟的例子，較少擴及歷史、宗教研究和哲學。文學是一個例外，因為大部分的文學研究者隸屬於國家語文系，或在小一點的學校是隸屬於現

6 更多對形上假設的經典過去，文獻計畫所無法解決的部分，參見 José Cabezon, "Buddhist Studies as a Discipline and the Role of Theory,"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8.2 (1995): 231-268。

7 對區域研究歷史的一個良好調查可以見 Julie T. Klein, *Interdisciplinarity: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1990), pp. 98-103。

8 一份命名為 "The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 in Title III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的報告，由身為 Director of the Aid to State and Local Schools Branch in the Office of Education 的 John R. Ludington 提交給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這份報告再版於 *PMLA*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75.2 (May 1960): 11-15。

9 見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p. 53。一個更近期的批評，主要關注到中國，可見於 Ban Wang, "The Cold War, Imperial Aesthetics, and Area Studies," *Social Text* 72.3 (Fall 2002): 45-65。

10 見於 John K. Fairbank, "A Note of Ambiguity: Asian Studies in Americ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1 (Nov. 1959): 3-9，和 Wm. Theodore de Bary,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Nonpolitical But Not Unconcerne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9.4 (Aug. 1970): 751-759。

代語文系；在兩者的情況下，強調的是漢語教學，而非中國文學或文化研究。縱使是有亞洲語言文化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或東亞語言文明系（哈佛大學）的學校，文學研究通常是首要的，歷史（通常是古代）是次要的。（現代歷史學者也許受聘於亞洲研究系，但更多時候適合在歷史系，這種古代亞洲研究的劃分是值得未來探討的一點）

既然如此，區域研究範式在漢學研究的領域上，具有什麼樣的影響？再說一次，雖然很難看出區域研究的地理政治目的，在漢學研究中是如何具有直接的影響，但區域研究範式的多學科方式，引領文學研究者抱持一個更具文化研究的態度，豐富借取來自歷史、哲學、宗教，甚至是經濟的材料，置於文學的閱讀脈絡中，捨棄「文學」經典的想法，以報紙、電影、攝影和圖像為探究對象，是極為明確的。特別是自從文化研究對意識型態、政治和經濟的問題產生興趣（雖然通常是抽象的理論），這個從區域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轉變，顯示了一個相對簡單之事的完成。Rey Chow, Chris Berry, Ackbar Abbas 和其他學者，用他們各自的方式，不只是歡迎文化研究的範式，也主動承繼其對這領域具有什麼樣意義的問題。Rey Chow（周蕾）所編的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Age of Theory: Reimagining a Field* (Duck University, 2001)，大量吸收理論的資源，且涵蓋了如文學、歷史、藝術史和電影等學科，擴大影響了探究的範圍，從中國到香港和臺灣。此外，Shih Shu-mei（史書美）在她 *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 和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兩本書中，不只是提出文化生產之國界的問題，也提出圖像與文學之界限的問題。最好的古代中國文化研究方法之範例，也許是最近興盛的後帝國時期之性別與兩性研究，始於包含 Ellen Widmer 和 Kang-i Sun Chang 等學者所編輯的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1997) 一書的出版。最近出版的是 Wilt Idema 和 Beata Grant 的《彤管》(*The Red Brush: 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

Harvard Asia Center, 2004)，使傳統中國女性書寫的全面評述課程成為可能。

三、20世紀英美文學和比較文學研究

現在筆者要談第三個對漢學的主要影響，亦即美國的英文系和比較文學系的現代文學研究例證。這是一個在這樣簡短的報告中不能夠充分處理的主題，將不再重複英國文學系的歷史，或比較文學提升為一學科的過程。而指出當文獻學和文學史，被一個也許可以稱之為「文學理論」的第三種學術途徑，連結起來的時刻，以及這對國別文學與跨國文學研究具有什麼樣的意義。Tzvetan Todorov 講了一個他剛到法國上大學時的有趣故事，他剛從故鄉保加利亞抵達：

我帶著索非亞大學文學院教務長的信來巴黎。1963年5月的某一天，我敲了巴黎大學某辦公室的門（那時唯一的巴黎大學），文學院學務長、歷史學家 Aimard 的門。他讀了信，問我尋求些什麼。我說我想要持續文體、語言和文學理論的學習——大範圍上。「但是你不能大範圍地學習這些東西！你想要專攻什麼樣的文學？」感覺到地板在我腳下塌陷，我可憐兮兮的回答是法國文學。同時我意識到我的法文越來越含糊，是因為那時有點顫抖。教務長高傲的一瞥，然後建議我跟著一位專家研究保加利亞文學應該會更好——法國總會有一些專家的。我有一點沮喪，但仍持續我的尋求，詢問周圍少數我認識的人。然後有一天，一位朋友的朋友、一位心理學教授聽我解釋我的麻煩，然後說：「我知道有另一個人對這些古怪的學科感興趣，他叫 Gérard Genette，是巴黎大學的助教。」我們在 rue Serpente 有幾間教室的一個隱密走廊見面，立即相處融洽，他對我解釋，除了這些之外，還有位教授在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開研究班，我們可以在那裡再碰面。這位教授的名字（我以前從未聽過）是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¹¹

11 Tzvetan Todorov, "What Is Literature For?" *New Literary History* 38 (2007), p. 15.

「新法國理論」(New French Theory)的開創人物，一開始是凝聚在文學是可以從一個普遍的觀點來分析這樣的想法上，而不是從歐洲和美國的語言文學系所聚焦的民族文學史限制上。1970年 Todorov, Genette 和 Hélène Cixous 一起出版了具有極大影響力的期刊 *Poétique*，為文學研究的新理論方向代言。

從特定文本到文學的普遍聲明之變遷，是新法國理論建立已久的，但是系統的嘗試來了解文學內在運行——什麼使文學成為「文學」？——是使近期理論轉向的主導問題。在美國，沒有一個機構有像耶魯大學在1970到1980年代中期一樣的影響力，當時 Paul de Man 和 Jacques Derrida 皆任教於比較文學系。號稱為「耶魯學派」(Yale School)，是法國理論(French Theory)在北美傳播的中心，隨之而來的是許多文學系，從文學文本研究到理論文本研究之強調的轉移。如同筆者在這篇簡短的報告中，一開始就提到的，當前時刻見證了來自「理論高峰」的轉向，再次包含了文學本身的研究。然而，沒有任何的回歸是一個單純的回歸，文學系所面臨的來自理論時代的新問題是：今日是什麼構成文學研究的合適對象？在什麼樣的程度上，由學系的機構層級所再造的國家分界，仍為人文知識生產的正當器械？

北美的漢學研究也站在某一個十字路口上，雖然它與大部分同類的文學系有顯而易見的不同。現代漢學研究不意外的包含了批評理論的使用，因為它參與了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民族文化和科技問題的影響。杜克大學出版社「亞太」系列和 *positions: east asia critique* 期刊(有時候是 *boundary 2*)，仍代表中國文學研究的刀鋒。研究員如 Theodore Huters, Leo Lee, Lydia Liu, Wang Ban, David Wang 和 Tang Xiaobing，持續有信心的致力於漢學研究和批評理論之間。理論先驅的開場喝采被認為是 Liu Kang 和 Tang Xiaobing 的 *Politics, Ideology, and Literary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 Theoretical Interventions and Cultural Critique*。批評理論所包含的，能否被視為是對西方理論知識存在已久的尊重，仍待觀察。

這部分，古代漢學研究對於全神貫注在批評理論的使用上，已有所遲疑，很大的原因是由於文獻學術的必要。受比較文學訓練的學者，包括 David Schaberg，走在文獻學需求和理論化趣味的中間。文獻學為理論的普遍聲明提供了遏制力，因為文獻學關懷的是從特定文本中可以得知些什麼，並非普遍原則的主張或哲學立場的綜合。此外，批評理論持續反映它方法的假設，甚至是學科唯我主義的論點，狹窄的聚焦在特定文本中，文獻學幾乎是反方法論的。¹² 企圖對古代中國文學採取一個更具理論意識的角度，並非都很成功。最具野心的嘗試，包括 Zhang Longxi 的 *The Tao and the Logos* (Duke University, 1992)、Haun Saussy 的 *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 (Stanford University, 1993) 和 Cai Zong-qi 的 *Configurations of Comparative Poetics: Three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University of Hawaii, 2002)。不像現代漢學研究，在古代文學領域中，理論組織的有效運用，通常必須具備複雜的辨證和方法的討論，因為在古代文本和現代(或古代)理論中，有一個難以跨越的距離。因此大部分的作品必須藉由比較文學，這一個長期掙扎於文化的不可比較性問題的學科之透鏡，來接近這個論題。確實，只有 Haun Saussy 的作品有持續的影響，這影響在比較文學領域中比在漢學研究領域中更能感受出。這些作品的限制，在於他們對「中國」此一抽象實體的詮釋，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也許有人會問，古代漢學的理論研究，是否需要並行或交替的比較，一方面是中國，另一方面是「西方」？如果企圖將漢學研究帶進與其他語言的文學研究之對話，超越這個無從比較且難以回答的問題是必要的。

大部分關於古代漢學的近期出版品仍傾向文學史和文獻的範疇，筆者要指出一個作品，意味著文獻過去和理論現在的重要相互關係：田曉菲(Xiaofei Tian)的《塵几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Tao Yuanming and Manuscript Culture: The Record of a Dusty Tab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05)。¹³ 這是一部以探討手抄本傳統中的閱

12 當然有重要的例外，如 Leo Spitzer 對文體學的研究，是對文獻學重要的理論貢獻。見 Spitzer, *Representative Essays*, ed. Alban K. Forcione et a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88)。

13 筆者也應該要提到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近期的新書，*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Cambridge: Harvard Asia Center, 2006)，其在廣泛的背景中亦提出相似的議題。

讀問題為中心的作品，也就是文本可靠性、異文和多重版本的文獻問題。而這也是一部關於閱讀異文和版本具有什麼樣的意義，以及這種多重性對文學史和詩歌存在論的建構，具有什麼樣意義的作品。田曉菲的陶淵明研究，對文本性的當代理論抱持一個重要的批評，縱使是最堅定的解構主義論者，當捨棄作者文本的穩定性存在時，仍會假定單一文本的首要性。田曉菲呈現的是，我們必須再往前跨一步，並移除文本自身的穩定性，因為在手抄本傳統中，可能存在多重的文本，沒有一個單一文本是優於另一個的。儘管只有一個文本留下，仍必須帶著這樣的認識去閱讀，它的留存是多種知識的產物——編輯者、選集、歷史家、收藏家——他們的動機很少是單純的記錄一個文本原有的樣子。因此，當文本不再穩定，詮釋和解讀會變得怎麼樣？該如何閱讀，或更精確的說，是閱讀哪一個文本？最後，田曉菲仍需要做一個選擇，儘管她的選擇通常是吸引人且具說服力者，但仍是帶有情感的個人主觀判斷。

將問題放在一邊，筆者認為田曉菲的作品在另一方面很能代表漢學研究的新成熟過程。這是一本理論化的著作，它輕披著理論的外衣，讓批評理論成為沒有權威

壓制的閱讀背景。它創造了文獻、文學史和批評理論可以共存的空間。

結語

這裡作簡短的報告作結，聲明自己立場的觀點。筆者相信的是，如果北美的漢學研究和其他語文的研究獲得相等的地位，或確實的在比較文學、世界文學中獲得空間，有兩件事會先浮現。¹⁴ 第一，我們必須超越中國和西方這簡單的二分，因為很大程度上這是沒有意義的（何謂「西方」？何謂「中國」？）。第二，我們必須讓主要文獻形塑我們提出的問題，而不是視批評理論為漢學研究的救贖。筆者擁護的是一種「內在閱讀」(immanent reading)，理論的產生來自於文本的閱讀，而不是來自於外部系統的強加。這不是一個特別新穎的觀點，或許會有人說哲學家如 Jacques Derrida 長期以來即爭辯類似的事。然而，就好像我之前提到的，這個回歸並不是單純的回歸，因為經過 1980 到 1990 年代理論知識的濫用，隨之而來對文獻學術的謹慎維護，到區域研究的認可，我們對研究的對象必須要抱持更寬廣、多學科的知識。

14 將比較文學系重新設立為「世界文學」系的推動已漸漸開始增加了牽引力。耶魯現在提供世界文學的大學部課程，鑒於哈佛的比較文學系，在主任宇文所安的帶領下，已朝向一個世界文學的模範推動。對這個主題有幫助的介紹，見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3)。

Apply Now

2010 Research Grant Applications to Assist Foreign Scholars in Chinese Studies

- ※ Deadline for applications is May 31, 2009
- ※ This program is provided for foreign scholars in departments related to Chinese studies at foreign universities or academic institutes.
- ※ A direct round-trip ticket between the domicile of grant recipients and Taipei is provided; monthly grants are awarded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scale :

Full Professor	NT\$ 60,000	Associate Professor	NT\$ 50,000
Assistant Professor	NT\$ 40,000	Doctoral Candidate	NT\$ 30,000
- ※ Grants are awarded for between three months and one year.
- ※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contact us at:

Tel: 886-2-2314-7321	Fax: 886-2-2371-2126
E-mail: ccsgrant@ncl.edu.tw	http://ccs.ncl.edu.tw